

# 陈子昂的生平和思想

韩理洲

## (一)

陈子昂，字伯玉，唐高宗显庆三年(658)生于四川射洪县<sup>①</sup>。祖父陈辩，“少习儒学，然以豪英刚烈著闻”，未曾仕宦。父亲陈元敬，于太宗贞观二十年(646)“乡贡明经擢第，拜文林郎”，但“属忧艰不仕”。元敬既对“群书秘学”广为涉猎，又有“瑰玮倜傥”的豪侠之风。有一年当地发生饥荒，他“一朝散粟万斛以赈贫者，而不求报”<sup>②</sup>。元敬在乡间为人判讼，也能主持公道。他还结交四方豪杰，被人称为“西南大豪”。因而，也招致了“不知深慈恭懿，敬让以德”的非议和州将县长的攻击。于是，也便从高宗永淳元年(682)开始“放息人事”，学习仙道，“饵云母以饴其神”，长达一十八年。陈子昂的父亲很希望后代继承这种家风，曾说：“吾家虽儒术传嗣，然豪英雄秀，泯泯不灭，常惧后来光烈，不象先风”<sup>③</sup>。

陈子昂降生人世之时，正值陈元敬为乡里判讼，广交四方豪杰之年。所以，少年陈子昂也“以豪家子，驰侠使气”，到了十七、八岁才开始入学读书<sup>④</sup>。在学习期间，他也广泛地涉猎了经史百家，特别是爱钻研经邦治国的学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经，历观《丘》、《坟》，旁览代史，原其政理，察其兴亡”<sup>⑤</sup>。书本知识从理性上提高了陈子昂，父亲在“庭训”时也勉励他成为匡夔明君的辅佐贤臣<sup>⑥</sup>。这

些教育，大大扩展了陈子昂的胸襟，使他树立了建功立业、“兼济天下”<sup>⑦</sup>、“论道匡君”的远大抱负(《登蓟城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序》)。

据《唐摭言》载：“永徽(650)以后，以文儒亨达不由两监者稀矣”。因为那时录取进士，“先两监者而后乡贡”。为了登上仕途，寻找建功立业的门径，陈子昂便在二十一岁那年，离开家乡，沿涪江南下，入长江，穿巴峡，经楚地，到了长安，在颇负盛名的太学深造。在长途跋涉中，诗人登山临水，凭吊古迹，咏史抒怀，缅怀建立了赫赫之功的大禹、诸葛亮、羊祜，感慨万端地唱叹道：“丘陵徒自出，贤圣几凋枯。谁知万里客，怀古正踟蹰”。显然，胸怀壮志的青年陈子昂这次游学求宦的目的，是要在来日有所建树，干出类似古圣先贤的事业。

在太学学习期间，他与文人学士往来，以文章“抵历群公”，希望能得到达官显宦的荐举，但未成功。永淳元年(682)春，他奔赴东都洛阳，参加了进士科考试，不幸落第。“转蓬方不定，落羽自惊弦”(《落第西还别魏四懔》)。科场的挫折，象一盆凉水泼向了热情上进的陈子昂。“怀策未闻秦”、“黄金装屨尽”(《送梁李二明府》)，诗人以说秦不成的纵横家苏秦自况，怏怏不快。

陈家“世好服食”，陈子昂受其薰染，“昔尝饵之”<sup>⑧</sup>。他落第返归时，陈元敬已放息人事，“山栖绝谷”。于时，陈子昂也过起了隐居生活。但他并非真要忘怀世事，冀图羽化飞升。史载，唐初统治者尊季耳为始

祖，道教俨然以国教面目出现，习道之风甚盛。有些文人学士也借助山栖学道踏入了仕途。曾与陈子昂互称“仙友”的田游岩隐居嵩山，在调露中得高宗礼遇，“并家口传乘赴都，授崇文馆学士”<sup>⑩</sup>。这种时代风尚，对陈子昂也是有影响的。因此，他虽身居山林，却对建功立业，存在着强烈而执着地追求。正如他在《谏政理书》中所说：“臣每在山谷，有愿朝廷”。

陈子昂家庭虽是世代富豪，但长期无人仕宦，是一个庶族地主家庭。因此，就连他本人也常常自称“百姓”、“巴蜀微贱”。这种卑贱的出身，使他便于接触和了解社会中下层的实际，特别是劳动人民的疾苦。青年陈子昂不但重视书本知识，也很重视社会调查。《上蜀川军事》叙述了他青少年时在家乡的调查说：“臣在蜀时，见相传云，闻松藩等州屯军数不逾百，计粮给饷，年则不过七万石可盈足。边郡主将不审支度，乃每岁向役十六万夫。夫担粮轮送，一斗之米，价钱四百。使百姓老弱，未得其所。比年以来，多以逃亡。”又如：《新唐书·本传》载，《上军国利害事》一文写于685年。其文描叙了从剑南到河陇秦凉、青徐曹汴、沧瀛恒赵等广大北方地区人民的痛苦生活说：“当今天下百姓，虽未穷困，军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由685年上推五、六年，正是子昂青年求学时。对社会状况的调查和对“王霸大略”的学习，不但培养了他关心时弊民瘼的思想，而且使他正确地估价了高宗末年“天下虽未穷困”，但民众“不安”的形势。这与陈子昂尔后的一登上仕途就能理智地提出“安人”的卓越的政治见解，与他一生始终关心国家，同情人民有很大关系。

对社会生活的认真观察和研究，又为他的诗歌创作走上批判现实的道路奠定了基础。青年陈子昂留心时事的激情与感慨时势的建安、正始诗歌发生了共鸣。他自觉地用“怅尔咏怀，曾无阮籍之思”，鞭策自己，

十分鄙视“迹荒淫丽，名陷俳优”，充当文学弄臣。所以，他一投入创作，就迸射出了与笼罩初唐诗坛萎靡颓佚的“宫体”、“上官体”炯乎不同的光辉。卢藏用说陈子昂“初为诗，幽人王适见而惊曰：此子必为文宗矣”<sup>⑪</sup>！

## (二)

683年12月，昏聩软弱的唐高宗病故于洛阳。684年春，皇太后武则天在短短的两月之内，废掉了中宗李显，接着又居睿宗子别殿，亲御紫宸殿。武则天是庶族地主利益的代表者，她狠狠地打击了贵族势力，实行了一些开明政策，特别是破格录用了一些庶族寒门的有识之士，从而给隶属于这个阶层的陈子昂带来了幻想。他称颂武则天是“非常之主”，临朝称制是“非常之时”，连他自己也是“幸属交泰”的时机到了。于是便再次于东都参加了进士科考试。果然，这次对策高第，释褐为将仕郎。这时，陈子昂踌躇满志，为了“再取连城璧，三陟平津侯”，迅速施展辅佐才能，以纵横家“危言正色，抗议直辞，赴汤镬而不回，至诛夷而无悔”的冒险游说精神，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向武则天上书两封，即《谏灵驾入京书》、《谏政理书》，陈述了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特别是在《谏政理书》中，提出了“安人”的政治主张。他说：“天地之道，莫大乎阴阳；万物之灵，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贵，莫大乎安人。”怎样安人呢？他提出了八条措施：一、皇帝要效法古天子的“躬籍田亲蚕”，奖励农业生产；二、学习周文王的“养之老五更”，用孝悌教化天下；三、明讼恤狱，不要滥使刑法；四、修文尚德，以止天下干戈；五、任用贤能，惩治贪吏；六、抚恤不能自食其力的矜、寡、孤、独、疲、癯、羸、老；七、放宫女、去雕饰、禁巫鬼、止淫祀；八、皇帝要以“至诚之心”、“以为天下先”，带

头履行上述几条。他天真地认为，只要这样做，“不出数年之间，将见太平之化”。

究其实，陈子昂提出的这些主张和措施，不过是唐初与民休养生息的基本政策。据《贞观政要·君道》载，唐太宗就多次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也反复告诫统治者要“识德义”，要“知足以自戒”，“知止以安人”，要节欲，要善于纳谏黜恶，不能纵情滥刑，实行“鸣琴垂拱，不言而化”的无为之治。和贞观君臣一样，陈子昂也在“安人宁国”的思想指导下，杂揉了黄老的清静无为和儒家的德教仁政。他在《上军国利害事》中说：“臣闻天下有危机，祸福因之而生。机静则有福，机动则有祸，天下百姓是也。”又说：“得天下之机，能密静之”。学术界好些同志只顾及子昂“安人”的政治主张和八条措施中的民本、仁政、德教的言论，而不顾及他有将“密静”与“安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论述，便断定他的主张是儒家思想，这是片面的。

基本上能够坚持太宗开明政策的武则天，看了子昂的疏谏，“奇其才，召见金銮殿”<sup>①</sup>，擢为麟台正字。

任麟台正字的最初两年，武则天对陈子昂较为赏识。既召见，又赐笔札，令“言天下利害”<sup>②</sup>。此时的陈子昂一方面由于处于暂时的顺境，另一方面由于初入仕途，对武则天执政的弊端了解不多，认识不足，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他心目中还没有充分展现。因此，这一阶段，他思想上的主要倾向是：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都充满了理想。他相信武则天能够实行“安人”良策，迎来三皇五帝式的理想盛世，自信自己能够顺利地建功立业，施展抱负。

公元686年春季，当了两年麟台正字的陈子昂满怀报效疆场、建功立业的热忱，随同左补阙乔知之等参加了征讨金徽州都督仆固始的北征。他随军入居延海，历张掖，经同

城，同年秋季返归。这次出塞驰驱，虽然没有得到朝廷赏赐，陈子昂在思想上却有重要的收获：

(1) 在甘州、同城等地，他认真考察了边地人民（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痛苦生活，增强了同情人民，关心国家利益的思想。诗人说：“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深为边民遭受外族入侵而担忧（《感遇》三十七）。他还了解了守边将士的生活和痛苦。在《感遇》（三）里，诗人为战士丧生，遗属无人安抚，愤慨地高呼：“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骨”。不言而喻，这是对统治者的谴责。

(2) 这次出征擦亮了他的眼睛，使他对统治者压制贤才有了认识。诗人“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很想有所作为，结果却是“磨灭成尘埃”（《感遇》三十五）。7月返归，复至张掖。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中，诗人负剑登上这座古城，想起这番徒劳的奔波，悲凉的唱道：

“纵横未得意，寂寞寡相迎”（《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已》）。不只诗人如此，同征的乔知之等也有同样的苦恼。冷冰冰的现实击碎热情洋溢的诗人充当辅佐和兼济天下的幻想。他悲愤地写道：“汉庭荣巧宦，云阁薄边功。可怜骢马使，白首为谁雄”（《题祁山烽树赠乔十二侍御》），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重用谗谄之徒、轻待有功之臣的黑暗制度。这时诗人开始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惆怅，甚至催促了早年的学道求仙思想的萌发。所以，这次北征，可以说是陈子昂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是陈子昂由赞颂美好的理想转入深刻尖锐地批判现实的开始，也是他的诗歌由豪爽乐观转入激愤悲壮的开始。

也就是在陈子昂北征这一年，武则天设铜匭，开告密之门，冤狱增多，其他弊政也有发展。“朝廷惶惶，莫能自固；海内倾听，以相惊恐”<sup>③</sup>。“安人”的问题成了更为突

出的社会问题。在其后的六年中，陈子昂集中地揭露了武后时的主要弊政，进一步发挥了“安人”之策：

### 1. 反对滥刑，主张措刑

684年武则天称制，激化了武周集团与李唐宗室集团的矛盾。9月间，徐敬业与大臣裴炎等内外勾结，起兵谋反；688年越王李贞与其子李冲又兴兵讨武，均很快被镇压。在这些斗争中，陈子昂是站在打击贵族势力的武则天一边的。他认为徐敬业等人是“凶乱之贼，叛逆之臣”<sup>④</sup>，武则天对他们的镇压是“顺天行诛”，做得完全正确<sup>⑤</sup>。但是，武则天借着打击“奸党”的名义，“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有迹涉嫌疑，辞相逮引，莫不穷捕考按”<sup>⑥</sup>，陈子昂是深为愤慨的。他尖锐地揭露：“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但“百无一实”。而武则天却对这些告密者予以庇护，“屈法容之”，对贪暴残忍，以滥刑邀功的酷吏，更是重用赏爱。他警告说：“臣以此上观三代夏、殷、周兴亡，下逮秦、汉、魏、晋理乱，莫不皆以毒刑而致败坏也”，特别是近代的隋炀帝，就是因“杀人如麻，血流成泽”而激起“四海云摇”的<sup>⑦</sup>。并在《谏刑书》、《答制问事八条》、《为朝官贺慈竹再生表》中，提出了措刑主张，要求武则天“严诛狱吏”，以安人心。

### 2. 反对穷兵黩武，主张息兵

前面说过，陈子昂从青少年时候起，就对蜀地人民所受的兵役之苦，有较多了解。北征返回后，随着社会见闻的增加，认识的深化，他则进一步明白了穷兵黩武的祸根。垂拱三年（687）朝廷计划开凿蜀山，由雅州道袭击生羌。陈子昂上《谏雅州讨生羌书》，认为“雅之边羌，自国初以来，未尝一日为盗”，因而讨伐是“徒杀无辜之众”。陈子昂力陈七不可，并尖锐地指出，这项穷兵黩武计划，是那些“欲图此利”的奸臣和“徇贪夫之议”的“陛下”（武则天）共同制定的。他总结历史教训，指出“自古国亡家

败，未尝不由黩兵”。他杂揉了儒家的“仁政”和道家的“宁静”，提出了“息兵”的主张。他说，陛下应“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圣人宁静，思和天人之时，不动甲兵，兴大役”。

### 3. 反对重用奸佞亲信，主张任用贤能

武则天执政时，改革选拔人材的制度，录用了一些贤才俊秀，如魏元忠、娄师德、狄仁杰、郭震、姚崇、宋璟等。但是，她猜忌多疑，反复无常，贤臣很少有善始善终者，连魏、狄等人也曾遭贬逐刑讯。另外，她也重用了不少奸佞亲信、酷吏贪官，如武氏宗族的武承嗣、武之思、武攸宜、武懿宗；男宠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亲属杨执柔、宋楚客、宋秦客、太平公主；酷吏周兴、来俊臣、万国俊、侯思止等。对此，陈子昂深为不满。他告诫武则天：“天下之政，非贤不理；天下之业，非贤不成。”他针对武则天猜忌多疑，翻云覆雨的个性，在《答制问事八条》中特意强调：“贤人既任须信，既信须终，既终须赏”。诗人还指出，重用无德无才的小人，就等于“微缕悬千钧”，必然丧失政权，见笑于时人（《感遇》二十四）。

### 4. 反对挥霍无度，主张节用爱民

武则天为了满足穷奢极欲的生活需要，常常任意挥霍民脂民膏，大兴土木。她崇信佛教，曾令男宠薛怀义役使大批工匠为佛塑巨型夹袪大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史载，造像、建明堂，“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府藏为之耗竭”<sup>⑧</sup>。在《感遇》（十九）中，诗人勇敢地揭露武则天穷尽金玉，强迫能工巧匠建造佛像的奢侈行为。利用佛教“清静道弥敦”的思想，对此作了批判，辛辣地讽刺说：“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

陈子昂的上述主张，切中了时弊，是对国家、对人民很有益处的高明之见。司马光称赞他论述“当今为政之要”的《答制问事八条》：“辞婉意切，其论甚美”<sup>⑨</sup>。王夫之说：“陈子昂以诗名于唐，非但文士之选，

使得明君以尽其才，驾马周而颀颀姚崇，以为大臣可矣”<sup>⑩</sup>！可是，陈子昂具有远见卓识的忠直之语，与武则天本人尽快南面登基的野心、贪婪不已的享乐欲望、纵横捭阖的权术阴谋，都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奏闻辄罢”<sup>⑪</sup>。698年，陈子昂任麟台正字秩满，也只按照常例，补了一个掌管兵器仓库的从八品下的小官——右卫胄曹参军。692年春，陈子昂因继母丧，解官返蜀守丧。694年守丧期满，又到了洛阳，虽然得到擢升，但也不过是一个从八品上的右拾遗而已！

### （三）

仕途的升迁，并没有给陈子昂带来欢乐。时弊得不到纠正，抱负得不到施展的苦闷，使他常常闹病，“居职不乐”<sup>⑫</sup>。不久，大祸飞降，子昂被诬为“逆党”，扣上“谋反”的罪名，关进囚笼。经过整整一年的折磨，才被释放出狱，继续担任右拾遗。这次几乎杀身殒命的沉重打击，使他深感“云海方荡潏，孤鳞安得宁”（《感遇》二十二），产生了忧谗畏讥，远祸全身的思想。该年12月20日，陈子昂在《送中岳二三真人序》中，向当时有名的道士司马子微等人表白：自己“实欲执青节，从白虬、陪饮昆仑之庭，观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冥骨甘焉！”这时的诗人，在痛苦的遭遇逼迫下，加紧了向宗教天国苦渡的步伐，向往隐逸的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此时的诗人并没有完全抛弃建功报国的欲望。695年出狱时，他在《谢免罪表》中说：“臣伏见西有未宾之虏，北有逆命之戎，尚稽天诛，未息边戍。臣请束身塞上，奋命贼庭，效一卒之力，答再生之赐”。一有机会，忧国忧民的诗人就要挺身而出。

696年5月，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联合起兵杀死了欺侮他们

的营州都督赵文翽。但他们又趁机扩大战争，入侵掠夺。9月，武则天的堂侄建安王武攸宜任清边道大总管，率军出征契丹。陈子昂以幕府参谋的身份从军出征了。这时，诗人又在游向宗教世界的苦渡中，作了一次回头的挣扎。他又以“援绳当系虏”的豪情（《东征答朝臣相送》），出洛阳，涉边关，在寒风凛冽的仲冬到达了幽朔之地。“蓟楼望燕国，负剑喜登兹”。诗人又高兴地北望燕山，东眺辽海，缅怀蓟丘故事，“以身报国，我则当仁”的壮志又勃然复生（《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序》）。

武攸宜“轻易无将略”，是一个草包司令。697年3月，清边道总管王孝杰、苏宏晖等，与孙万荣战于东峡石谷，十七万大军全部覆没。王孝杰惨死，苏宏晖在战乱中逃归。武攸宜闻风丧胆，“军中震恐不敢进”<sup>⑬</sup>。当此安危成败之时，“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的陈子昂，挺身急难，直言不讳地批评武攸宜率军“法制不申”、“前如儿戏，后如儿戏”，自愿带万人前去冲锋陷阵。谁知一片忠心，一番刚直之言，却惹恼了昏庸无能而又刚愎自用的武攸宜。他不但不采纳陈子昂的意见，反而将他由参谋降为军曹，只让掌管文书。陈子昂报国无门，献身无路，刚刚复苏的建功立业精神又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此时的诗人，又登上了蓟北楼，但已不是前次的“负剑喜登兹”，而是“泫然流涕”了。此时的诗人，缅怀曾在此地礼贤下士的燕昭王，追慕“逢时独为贵”的乐毅、郭隗、邹衍等，联系自己遭受压抑、怀才不遇的现状，悲愤填膺，仰天长叹，挥笔写下了《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接着又声泪俱下地唱出了千古寒士与之共鸣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697年7月，慷慨报国的陈子昂带着满腔愁闷回到了洛阳。这时，离开这恶浊的官场的念头，儒家的“独善其身”、道家的遁世

隐居、佛家的缘业禅居时时萦绕在诗人脑海，隐退的古人成了他的榜样。在《感遇》(十五)中，诗人说，统治者猜忌多疑，有才之士多是悲惨的结局，还是学习范蠡乘舟隐去吧；在《感遇》(十八)中诗人又说，在碌碌结驷的社会，忠直正派的人是无容身之处的，还是学习陈仲子的隐居和张孳的解官归里吧！

经过几度的徘徊，痛苦的思想斗争，诗人怀着对黑暗现实的愤怒，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挂冠归里。他拿起伴随自己战斗了一生的武器——雄笔，声音颤抖，如诉如泣地说：自己本“以为得失在人，欲揭闻见，抗衡当代之士，不知事有大谬异于此望者……雄笔！雄笔！弃尔归吾东山，无汨我思，无乱我心，从此遁矣”（《与韦五虚已书》）。于是，他便于698年秋，以父年老为借口，“表乞归侍”。武则天故作优待的姿态，让他带着拾遗官的空名返回了老家。

陈子昂返归后，在射洪西山建造茅草房数十间，“种树采药以为养”<sup>②</sup>。刚刚四十出头的诗人这回真的林卧山栖，服食练丹，冀想羽化飞升了。

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者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sup>③</sup>。陈子昂便是在黑暗的封建社会压抑下，在“没有获得自己”和“再度丧失了自己”的情况下，只好游向彼岸的宗教天国寻找精神慰贴的。但是，玄默的隐居生活并不能消除诗人内心的痛苦。他在《感遇》(二)中写道：“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萸冒紫茎。迟迟白日晚，嫋嫋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幽居山林，见到兰泽、杜若也不由得触景生情，感叹自己岁华摇落，志业未成，诗人沉重的精神负担是可想而知的了！

另外，在隐居期间，陈子昂也没有真正消除是非之心。“幽居观大运，悠悠念群生”，他仍然惦念着人民的疾苦；“尧禹道已昧，

昏虐势方行”，他仍憎恶黑暗腐朽的势力。在此时为地方官吏撰写的碑志中，仍然热情赞颂善政爱民的廉吏，愤怒斥责渔侵百姓的贪官是“硕鼠”、“饿狼”<sup>④</sup>。他还准备写一部《后史记》，草就了提纲。这一切说明，宗教意识虽然使陈子昂走上了消极颓唐的道路，但是陈子昂毕竟还是陈子昂。

699年7月，陈子昂父陈元敬病故，陈子昂哀恸守丧，并于该年10月为父撰写了碑文。心肠狠毒的武周集团的奸佞之徒，存心要将他置于死地。他们“附会文法”，将诗人再次投入囚笼，严刑重责，陈子昂无可奈何，被迫自杀于狱中，终年四十二岁。

陈子昂的一生是执着追求美好理想，为匡国安人勇敢斗争的一生，是怀才不遇，坎坷不幸的一生，也是大胆革新，振兴唐诗的一生。凶暴忍残的统治者虽然利用手中的强权结束了陈子昂的生命，但却无法淹没他忧国忧民思想和刚直不阿的品德，特别是无法淹没他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写下的光辉一页。以唐诗自豪的中华民族，至今也没有忘却这位改革诗风的杰出战士、勇敢的先驱。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sup>⑤</sup>，一直为百代传诵。

#### 注：

① 拙作《陈子昂生卒年考辨》（见《西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

②④⑩⑲ 卢藏用《陈氏别传》

③ 陈子昂《堂弟公墓志铭》

⑥⑦⑧⑫⑬⑭⑮⑯⑰⑱ 分别见陈子昂《谏政理书》、《同宗参军之问梦赵六赠卢陈二子之作》、《麈尾赋》、《上军国利害事》、《谏用刑书》、《答制问事八条》、《张君吏人颂德碑》

⑥ 陈子昂《陈公墓志文》

⑨ 《旧唐书·田游岩传》

⑪⑲⑳ 《新唐书·本传》

⑫⑬⑭ 《资治通鉴》

⑳ 王夫之《读通鉴论》

㉑ 赵儋《旌德碑》

㉒ 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

㉓ 韩愈《荐士诗》